

汉字·文言文·章黄学派*

王 宁

摘 要：中法学者从学术高端上讨论汉语汉字问题是一种深度跨文化交流，本文主要阐释三个问题：汉字的性质、中国文言文简史、从跨文化角度阐释清代朴学传承至今主流学派——章黄学派的内在价值与现代传承意义的理念与方法。

关键词：法国汉学 章黄学派 汉语 汉字 文言文

法国的汉语教学始于17世纪，最早编写的教材是从教汉字开始。400多年来，法国是一个始终关注着中国文化的国家。法国几代高端的汉学家都有十分丰厚的汉语文言文阅读与研习的水平，他们从中国的经史元典中来探讨中国文化，积累非常丰厚。当我知道汪德迈和金丝燕两位教授要主编《汉语文言读本》时，内心深深感动。在不同国度跨文化的交流中，相互的包容已属不易，即使一分理解，也会带来一分欣喜，而当你发现另一个国度的朋友是从根儿上深度地研究汉语、理解中华文化，又会怎样？你首先会产生一种“知己”的感觉，之后是出于对他们突破难度、追求深度精神的钦佩。

中国文化以汉字为基石。汉字是一种数千年从未中断的表意文字，它在汉语发展的推动下按照表意文字独特的规律发展，成为历代中国经史、文学典籍不可取代的载体。汉字不仅是汉语的书写工具，而且在它的构形、构意中承载着灿烂的中华文化，表达着中国人的思维方

* 本文是作者从跨文化学的角度反观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方法论的一种思考，另见作者为〔法〕汪德迈、金丝燕编《汉语文言读本》撰写的《序言》。

式，蕴藏着东方的审美情趣，成为传承古老中国的历史不可或缺的纽带。从汉字入手，以3500年的传世文献为根基，这是解读古老中华文化、梳理中国历史的正途。

这样去解读中国，必然会遇到文言文问题。文言是一种与先秦口语交互发展的书面语。汉语和所有活的语言一样，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人们思维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过了几百年、上千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汉语的口语不论在语音上、词汇上还是句法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不再用先秦的语言交流思想和进行交际了。汉初距周平王东迁不过970多年，一般人已经很难读懂先秦的文献，需要专家来进行注释。唐代始于公元618年，距汉初不到四百年，当时的人读汉朝人给先秦典籍作的注释已经感到生疏，又要请专家来进行二度注释。可见时代造成的语言隔膜有多大！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已经有了用白话文记录下来的俗文学，可以从中窥到当时口语的情况。这种古白话已经与现代汉语比较接近，而与先秦文献语言差距相当大了。按照语言发展的正常情况，与先秦口语一致的先秦文献书面语，似乎已经是一种既往的历史现象。但是并非如此：在长期的古代社会里，汉语口语虽然发生了变化，书面语却一直在模仿儒家经典使用的先秦文献语言，把这种模仿的语言规定为正统的书面语言，在政治领域和正统教育中，凡提笔属文，仍要保持先秦文献语言的语法和词汇。这便凸显了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叫作言文脱节。根据考证，文言与口语大约在两汉之后就已经形成人为脱节的趋势，这就是汉语史的分期一般采取把两汉以前作为上古阶段的原因。这样，我们便可以认识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的两大特点：第一，它是脱离口语的，带有超方言性。不论是哪个方言区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言来读文言。文言是目治的书面语，汉字也不是拼音文字，方音有差异，但不会影响人们用文言文来交流思想。第二，它带有人为的仿古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时代的。文言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唐代以后的仿古文言，与上古文言比较，

有三点明显的区别：首先是，增加了较多的双音词；其次是，实词虚化的数量增加，表示关系的介词、连词和介于实虚词之间的副词增长较快；最后是，由于修饰语和包孕句的增多，句子加长，有些句子长达数十字甚至上百字，平均句长也增加了不少。这些变化都是在仿古的基础上受到当时口语的影响、吸收了外来文化，以及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不过，即使如此，中国的文言在基本的结构特点和词汇语义系统方面都没有脱离先秦的范式。

作为历史语言的文言文，在历代语言生活中也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由于文言文是上层文化和正统教育使用的书面语言，它是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共存的。用文言文记录的典章制度及史料，用文言文撰写的实用文体和文学作品，多到不可计数，时间跨度大约上下三千多年。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汉字的作用是“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汉字书写用以“垂后”、“识古”的，正是这种文言文。

文言文与现代汉语互相影响。在古代社会，书面语对口语的影响比之现代更为强势。文言词汇的古义，在现代汉语里屡屡保存，《说文解字》中的小篆及其古义，70%以上保留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构词语素里。很多文言句法结构的方式，在现代汉语的句子中已经消失，但在构词法中，还有很强的再生能力。所以，不但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必须学习文言文，深入了解汉字需要学习文言文，就是深入了解和使用现代汉语，也必须学习文言文。因此，我说汪德迈和金丝燕两位教授主编《汉语文言读本》，是从根儿上深度解读汉语和中华文化，确实是由衷之言。

我们是在深度的跨文化交流中结识了法国有很深造诣的汉学家汪德迈先生和金丝燕教授的。这次参与跨文化的交流，对于我们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0世纪初，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学，在弘扬传统文化、发展本国语言文字的目标下，与新文化运动同时推出，章太炎是这个学术领域的

领军人物。之后，他的学生黄侃（季刚），初步完成了“小学”向“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推进，章黄学派由此产生。在学术渊源上，章太炎是乾嘉国学的殿军，他的学术积淀着传统国学广博的知识，有着清代乾嘉小学与经学丰厚的修养和积累。而在世界观和时代精神上，章太炎的国学充溢着新文化建设的理想，与宗法制度下的国学、被宫廷垄断的国学、泥古后退的国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是黄季刚先生的入室弟子，章黄之学在当代的重要传人。是他创建了北师大的古代汉语学科，坚持章黄之学的继承和发展，坚持中国语言学的自主创新。

章黄之学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文化自信。太炎说：“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言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语言和历史的有棱角的，是有民族性的，不论是交流还是研究，不同语言具体的差异性比之抽象的共同性，永远是更为重要的。

章黄之学具有面向未来和社会深谋远虑的致用观。他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每每有深刻的“多看出一步”的思考。例如，20世纪初，“取消汉字”的思潮十分盛行。章太炎深知几千年的教育垄断造成汉字的繁难，亲自参与制定注音符号，用以普及教育。但他同时指出，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明确反对“汉字落后论”。对汉字改革问题，他眼光远大，思虑周全，明确指出，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用仍是无法取代的。这是章黄之学高度重视汉字的科学研究、注重引领汉字教育的主要原因。

章黄之学有着保持理性、探究本原的科学精神。章太炎、黄季刚先生在发展《说文》学的过程中，突破了清代末流文人繁琐的考据，以追求“所以然”的科学精神，把中国语言文字学引向理论的探讨。

他们继承“小学”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求实作风，善于从大量语言文字材料中归纳条例，多次表明要明其条例，贯其会通，要其义理，探其根本。这是他的语言文字学能够较好地与现代语言学接轨的重要原因。章黄《说文》学采用系联的方法，看到《说文》内在的形音义网络，隐含着系统论的原则，从而将汉字学理论化。

章黄之学反对疏空学风，重视文献解读。他们继承了古文经学家“求实”的精神，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传统，被简称为“小学—经学—史学”。“小学”指古典的语言文字之学——周代的教育制度，宫廷的孩子8岁入小学，先教汉字，所以称语言文字之学为“小学”。两汉以后，“小学”逐渐被划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门，章黄又概括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学”，彰显了其中语言的因素。“小学—经学—史学”这个教育传统的基本精神，就是重视第一手材料，将先秦、两汉的儒家经典，加上诸子之书、文学文章之书，看作历史的实录，都用语言文字来解读，尽量求实地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以求客观地对历史事实和思想做出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的古代汉语学科传承和发展章黄之学，一方面是重师承；更重要的是被章黄之学的理论主张和学术精神所折服。越是深入了解自己，越是具有世界的意义。现在，通过平等的对话，将中华文化的精华介绍给世界，并在这种交流中获得世界各国的理解，同时也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来丰富自己，是章黄之学继承者的一项重要重要的历史使命。

章黄之学的精神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汉语文言读本》的意义，所以，我要再次说到“知己”和“钦佩”。21世纪进入了信息时代，国家之间地理的距离被信息的速度缩短，各国文化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成为世界文化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不同语言文字的对话，普及固然应当关注，但更为重要的是高层的、深度的对话和理解。《汉语文言读本》的编写，不是简单的一本选集，更不必在意它在法国的阅读者暂时还是少数人。应当看到，它是东西

方两个有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中国和法国的深度交流，从根本上的对话。因为深度的共鸣，所以是跨文化的“知己”，因为深感编写读本工作的难度和克服难度的智慧，所以有真心的“钦佩”。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